
美國的極端化是鐘擺現象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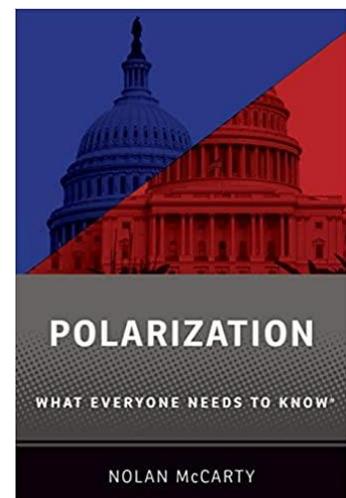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中美磨擦日益加劇，新冠肺炎沒完沒了，正當美國面對著內憂外患之際，社會撕裂更加令到許多問題雪上加霜。有趣的是，有些人爭論到底美國社會是否真的存在著嚴重的分化。有些評論家認為，現在關於選舉和對資訊真實性的懷疑並不見得比以前更加嚴重，在國家成立之初，這種彼此猜忌的情況已經存在，例如第一任總統喬治·華盛頓曾經說：「報紙上充斥著種種煽動性的言論，令人沮喪失望、漠視事實和惡意的虛假陳述可能會歪曲了我的政治主張。」第三任總統托馬斯·杰斐遜（Thomas Jefferson）也說過類似的話：「現在，報紙上看不到任何值得相信的東西，事實真相因被污染而變得可疑。」不過，這些只是片言隻字的抱怨，在那個時代並沒有 QAnon 和「暗黑勢力」（Deep state）等攻擊整個制度的陰謀論。

另外一些爭論是關於這種分化的性質，政治學家提出了三個不同的概念：普遍人說的「兩極化」（Polarization），是指越來越多人支持極端的政策和思想，在黨內和黨外，中間派、溫和派的空間越縮越小。另外一個概念是「黨派洗牌」（Party sorting），意思是每個黨派裏面越來越趨於單一化，民主黨變得更民主黨，共和黨變得更共和黨。然而，在兩黨之外仍然有很多中間派和獨立派。最後一個概念是「黨派忠誠」（Partisanship），顧名思義，它的意思是人們對自己的政黨十分忠心耿耿，但極力反對其他任何黨派的主張，黨派忠誠的現象一直存在，可以說這是普遍的人性，筆者認為並不值得大驚小怪。

「黨派洗牌」是經年累月政黨發展的自然結果，真正值得令人擔心的是「兩極化」，在兩極化之下，無論是黨內還是黨外都缺乏了中立意見和妥協餘地，種種跡象顯示美國社會正陷入此一困境。

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諾蘭·麥卡蒂（Nolan McCarty）發現，美國的兩極化比其他西方民主國家更為嚴重，而且美國的右派比左派走得更遠，換句話說，今天右派更傾向於擁抱極端的意識形態。一些研究顯示，左派人士從比較廣泛的渠道吸收不同的資訊，但保守派人士的消息來源則比較狹窄，而且傾向於轉發未經證實的消息。



請讀者不要誤會，我並不是說左派比右派「優越」，我認為這種現象是鐘擺式的歷史發展趨勢，簡單地說，那就是物極必反。事實上，在1960至1970年代，美國左派的激進



程度遠遠超過保守派，例如嬉皮士運動、性解放運動顛覆了傳統的道德規範；1968年北越的「春節大進攻」扭轉了美國人民對越戰的看法，1971年《紐約時報》、《華盛頓郵報》公開了《五角大樓文件》，令到反戰運動火上加油；1974年尼克遜因

為水門事件而辭去總統職務，繼任的福特總統特赦了尼克遜，人民覺得這是官官相衛，對政府的信任跌至谷底。無怪乎歷史學家凱文·克魯斯（Kevin Kruse）和政治學家朱利安·澤利澤（Julian Zelizer）認為1974年是美國政壇和社會的分水嶺。在1970年代，威脅美國的大多數恐怖組織都是本土的左翼分子，例如「地下天氣」（Weather Underground），「黑人解放軍」，「共生主義解放軍」（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）.....等等。聯邦調查局透露，單在1972年，美國已經發生了一千九百多宗爆炸案。

1981年保守派的朗奴列根就任總統，這種極端的左翼思潮漸漸受到控制，1989年東歐變天，1991年蘇聯解體，史稱「蘇東坡」，左派思想隨著冷戰正式畫上句號後破產。1992年，保守派政治學家弗朗西斯·福山（Francis Fukuyama）撰寫了《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個人》一書，宣稱政治意識形態的爭論已經結束，蘇聯解體證明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類政體的最終形式。1974年固然是一個分水嶺，而1992年則是另一個分水嶺，世界大鐘由極左而擺回右，然而，福山太過樂觀了！政治的爭論並沒有就此終結，由於很多國內國外問題都未能得到圓滿解決，故此近年的趨勢是由略右而擺向極右，這些棘手的問題包括了美國在國際舞台的角色、非法移民、種族矛盾、經濟平等.....，這需要用另一篇文章去交代。

無論是極左還是極右，都會為社會帶來災害，儒家的中庸之道是萬古常新的道理。

2020年12月9日

[更多資訊](#)